

阅人读事

寿山石雕鼻祖杨玉璇

□王毅霖

寿山石产于福州城郊三四十里的地方,石因山而得名。福建寿山石形成于数千万年前的某一次火山大爆发,尽管它们不过是地球上诸多矿产中的一小部分,但却机缘巧合地创造了璀璨多姿的文化历史。

在寿山石雕刻艺术史上,第一位在作品上留下工匠姓名的明末清初的杨玉璇。这位大师除了留下一定数量的作品,以及同一时代人对零星的艺术评价之外,可查的资料甚少,以至于许多专家学者在对其考究之时错误甚多。当然,相比于之前的无名可考的工艺界匠师们,又可谓幸之又幸。

同一代人的记载

寿山石的成分包括地开石、高岭石、珍珠陶石、叶蜡石、绢云母、石英等,数十种矿物成分成就了这一印石界的翘楚。因成分组合各不相同,造成了寿山石五彩缤纷的特性,也成就了寿山石雕工们善于运用巧色的特点。

只不过,收藏家们往往不关心他们钟爱的物件包含了哪些化学成分,除了论及雕工与篆刻艺术水准的高低之外,他们之间谈论的主题经常涉及色彩、质地、手感、包浆等一系列把玩中形成的术语。

作为雕刻的历史,可考证的最早的寿山石雕是在南朝,那几个墓葬中出土的寿山石卧猪,现存于福建博物院,雕刻造型朴拙大方,刀法简单凝练。这表明距今大约1500年以前,寿山石已然成为随葬雕刻的石材,亦成为寿山石雕刻史上最早的范例。

大概发展到宋代,这种早期只用于随葬的工艺得到一定的拓展,乃至于官方采之以为器物。清代《观石录》载:“宋时故有坑,官取造器,居民苦之,致致巨石塞其坑,乃罢贡。”

而作为民间艺术品并广为流传的,当从明代开始。考证杨玉璇生平及艺术,最佳的文献莫过于同一时代人的记载,包括清初周亮工(1612—1672年)的《闽小记》《印人传》,高兆(1615年左右—1699年)的《观石录》,以及朱彝尊(1629—1709年)的《寿山石歌》。

《闽小记》于“闽中绝技五”中载:“漳浦杨玉璇一寸许三分薄玲瓏准提像。”把杨玉璇的雕刻列为“闽中绝技”之一,所提及的“准提像”,为杨玉璇所作的浅浮雕或薄意雕刻。

又据清康熙三十七年(1698年)陈汝咸重修《漳浦县志》所载:“杨玉璇,善雕寿山石,凡人物、鸟兽、器皿,俱极精巧。又能以寸许琥珀作玲瓏准提,毫发毕露。”可见所谓“薄玲瓏准提像”的材质可能为琥珀或寿山石。

《印人传》于卷三《书张鹤千图章前》云:“张鹤千日中,毗陵人,旧家子,学书不成,弃而执艺,从蒋卿学雕刻鸟兽龟鱼之钮……以予所见,海内工此技者,惟漳浦杨玉璇为白眉,予《闽小记》中称为绝技,鹤千亦何让玉璇哉……玉璇年七十余矣,此技当恐终属鹤千耳。”

文中评论张鹤千印章雕刻的艺术高度及为人品性,尽管杨氏只是作为陪衬而提及,却无意间透露出重要信息,包括“以予所见,海内工此技者,惟漳浦杨玉璇”与“玉璇年七十余矣,此技当恐终属鹤千耳”,前者以作者的眼界,认为海内工于这一技艺者,杨玉璇称最,只是杨玉璇年事已高,足足七十有余,将来登峰造极之人,还是终究要落在张鹤千的身上。

《观石录》载云:“王君宠,十八枚,汉玉色,杨蓉(杨玉璇)作钮,项上微紫——神品。”“杨蓉(应为杨玉璇)作钮者八九,韩马、戴牛、包虎,出匣森森向人,磬磬尽致,出色绘中。”

《观石录》撰于康熙戊申年(1668年),并于康熙己未年(1679年)由作者本人再度作跋。这是



寿山石雕观音像

周亮工达摩面壁像

寿山田黄石兽钮方章

被业内视为专论寿山石的第一篇著作,文章记录了高兆11位友人所收藏的140余枚寿山石,其中涉及诸多史料和对现状的描述,但所提及的雕刻师仅杨玉璇一人,可见其工艺在当时的影响力。《寿山石歌》云:“是时杨老善雕琢,钮压羊马麋鹿。”诗文所提及“杨老”指杨玉璇,亦是诗文所提及的唯一人物。

生于明万历年间

尽管以上文献没有涉及杨玉璇确切出生年月等详细个人信息,但其中许多资料可以彼此对照,用以作出推断。

考周亮工及其《印人传》,周于1670年开始编撰《印人传》并于1672年5月(康熙十一年)61岁时去世,此时的杨玉璇70余岁,可见,杨玉璇的出生当为1600年左右或前几年。这种考证想来差距不会太远。这位名噪一时、声誉朝野的工匠师大致生于明代的万历年间,而主要活动于明末清初,以至于同时代年龄稍小的高兆和朱彝尊都推崇备至。

遗憾的是,关于这个寿山石工艺界的耀眼之星,家族的族谱没有为其空余出一个合适的位置。在其故里漳浦县佛昙镇,家乡人对于这位游子有如放飞出去又断了线的风筝一样,没有过多的音信,仅在口口相传的记忆之中,若有若无地存在相关微信信息。

考其缘由,是一个历史的大事件横空而出,为这种信息链接的中断埋下伏笔,那就是清代康熙年间的迁界政策。在佛昙镇杨家族谱里,关于迁界前后数代先祖的记载早已散失。一些专家甚

至作出猜想,认为杨玉璇定是在迁界政策下,生计受到了影响,不得不出走于省城。

回到大师生活的时代,我们可以留意一下那一时期其家乡的艺术生态环境,譬如当地的石雕等工艺。岸头村为明代杨守仁所立的万石秋卿牌坊,与下坑村杨守仁墓葬出土的一对花岗岩加禄晋爵石像生,从中大致可以看出这一时代当地或周边石雕的艺术水平。

前者因岁月的剥蚀而残破不堪,但其中“万石”与“秋卿”等文字至今依然清晰可见,牌坊横幅刻有:“为江西建昌府知府、浙江严州府知府、直隶太平知府、湖广贵州府知府杨守仁立。”牌坊主结构为花岗岩,雕刻的构件为青石,这两种石材都是当地盛产的矿产资源。牌坊上部一侧现今残留一麒麟透雕构件,形象奇特而生动,细节突显,张开的长嘴更凸显雕刻者的功力。四边布以藤蔓状的云纹,这种风格似乎有别于当时中原一带的雕刻风格。

后者系墓葬出土,基本保存完整,两个1米多高的长方形石板上各刻一高浮雕人像,形象雍容大度,年纪在中老年间,一手手奉一鹿,另一手手奉一爵,动作舒缓沉稳,衣纹飘动凝练。翻动的宽袖底部和靴上层的袍底,厚实中见灵动,真可谓匠心独运。

除了大型的石材雕刻之外,当地文献记载的雕刻工艺品主要是琥珀雕刻。漳浦的琥珀资源丰富,佛昙镇历史上亦有琥珀矿脉,康熙年间的县志就载有杨玉璇琥珀雕刻的信息,大概也能说明,杨玉璇离开漳州前,当地雕刻工艺的水平及其常用的材质。

落款可考第一人

明代晚期,漳州月港崛起。小范围的月港指今天的海澄、石码一带的港口,大范围的月港其实是整个九龙江入海口,甚至包含厦门港以及漳州诸多小港口的港口链,佛昙港亦在其中。

漳州相关史志多有记载当时民间海外交通贸易的盛况。明崇祯《海澄县志》载:“舶主而下,多财善贾者元不数人。间有凭子母钱称贷金,辄附众运行者;又有不持片钱,空手应募得值以行者,岁不下数万。”仅一海澄县,下海经商与应募者,年不下数万,更何况整个大月港区。

可考的平和寇拉克瓷外销,就从明代中期起,由漳浦旧镇港入海,远销东西洋。彼时的平和县会聚众多当地与外地的制瓷与绘瓷高手,其中包括许多景德镇的工匠艺人,他们因为事业与生计,迁居到此。许多博物馆与私人收藏的器件证明,当时瓷绘甚至因接受了相当数量的海外订单,而受到域外风格的影响。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国际文化交流在这一时代共同生发,并渗透到一方的普通民众。

海洋贸易使得整个东南沿海,特别是漳州地区,迅速感受到经济高速发展与文化自由蓬勃的气息,漳州的工艺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。可惜在朝代更替之中,特别是清初的迁界令,使得当地的文化与经济发展急转而下,迅速地走向封闭。

杨玉璇当年离开故里,走向省城,定居于福州,甚至有专家声称其当过宫廷御工。可以肯定的是,传世的杨玉璇作品基本都与宫廷有关,其作品多作为宫廷的贡品应无多人的异议,但其人是否为宫廷御用,目前没有可考的证据。已有的文献资料倾向于,杨玉璇是一个生前作品就炙手可热的民间工匠师。

重新梳理这段旧故,是为寿山石雕厘定一个艺术脉络源头,这位作品大量被宫廷所收藏的寿山石雕工,因为落款成为第一个可考的大师。一段时间以来,笔者曾致力于探究为什么寿山石雕至杨玉璇始有落款的问题,尽管迄今为止未有精确的答案,但同一时代的许多工艺大师大概可以用来作为参照——

明代正德年间,制壶大师供春为紫砂壶作最早的款识。景德镇嘉靖至万历年间,制瓷大师吴十九常以“云隐老人”为款识。德化嘉靖至万历年间,制瓷大师何朝宗常以“何朝宗印”为其陶器人物造像落款,开创了德化陶瓷艺术印的何派。

显然,这些不同地域的工匠师们在各自的行当里,因为留下款识第一人而成为该领域的标识人物。在相近的年代里,他们不约而同地觉醒了工艺的创作自觉,显然不仅仅是偶发的。

中晚明时期,心学崛起,文人与商人、匠师等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交融与合流,民间工艺师文人的倾向达到了空前的高度,这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追求,工匠自觉地向艺术靠拢,并造就了一个工艺大师涌现的时代。

稍后于杨玉璇的两位漳州籍雕刻师周尚均和王斋生,一般被认为是杨玉璇的弟子。许多清代鉴赏家认为周尚均的艺术成就逊于杨玉璇,甚至也有认为已经超越了。如清代嘉庆、道光年间的徐康在其《前尘梦影录》道:“印钮以尚均制作为第一,杨玉璇次之,皆国初名手也。”又《漳浦县志》载:“王斋生,善刻寿山石人物,又能以桃核刻小舟为东坡赤壁游,橈机舵棹毕具。”

杨玉璇、周尚均、王斋生三人一同被视为明末清初寿山石雕漳州工的代表,并作为寿山石雕刻艺术的开拓性人物。其中,杨玉璇则被称为鼻祖。

(作者为福建工程学院海峡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、副研究员)

乡土史记

清代如何保护鼓山:防乱葬、防盗砍

□郭进绍

鼓山坐落于福州城东,闽江北岸,早在晋两晋时期就名闻遐迩,有“左鼓右旗,全闽二绝”之称。山上的涌泉寺始建于唐朝,1000多年来香火旺盛,被誉为闽刹之冠。

为了维护八闽佛教名山的门面形象,历朝历代都对鼓山涌泉寺的周边山林环境加以保护,禁止普通民众在此私建坟墓、滥砍滥伐。但古代基层控制能力有限,管理较为松散,一些村民潜入寺院所属山地,偷偷造墓、砍树,也是在所难免。对鼓山的保护与破坏,就像一场延续千年的保卫战,尽管偶有失控,但总体上保持了良性发展的大趋势。

在清代《鼓山志》收录的官府公文里,记载了两件保山护林的典型案例,很具有代表性,值得仔细道说。

清康熙十一年(1672年)冬,寒风凛冽,福州府衙来了位告状的和尚。这位出家人法号道悟,乃鼓山涌泉寺的监院僧,就是协助方丈处理寺院综合事务的当家人。道悟和尚向福州知府递上诉状,说有林姓乡民在涌泉寺般若庵附近建造墓穴,侵占了寺院山地,破坏了鼓山环境,违反了官府刚刚颁布的保护鼓山涌泉寺相关禁令。

福州知府见有民众公然违禁盗墓,干扰佛门清静之地,随即派人前往鼓山调查处理。本以为这是桩简单案件,没料到后来案情反反复复,甚至还闹到了福建布政使和福建巡抚那里,前前后后折腾了大半年。

经查,确实有林姓人家将先人墓穴建在鼓山般若庵附近。这林家在当地是大姓,各种关系盘根错节,应算是乡间土豪。但是当时的人都迷信,对满天神佛充满了敬畏,林家尽管势大,然而与涌泉寺这种佛门圣地打官司,想来也是心中发

怵,毕竟“不看僧面看佛面”,所以一开始林家人也自觉做得不对,满口答应将坟墓迁走。

只是后来经乡绅、地保说情调解,林家人中的强硬派见有可能糊弄过去,就拒绝迁坟了。给出的理由是林氏墓穴早在三四年前的清康熙八年(1669年)就建在此地了,有坟头木牌的落款时间为证,而官府的相关禁令本年才颁布,这种旧坟怎么能算侵占违禁呢?当地官员、乡绅为了息事宁人,也帮着林家说话,说既然这墓葬属于遗留问题,就暂且留着吧,以后不准再营造新坟就是了。

道悟和尚不认林家旧坟的说法,见福州府似有偏袒之意,就向福建布政使和福建巡抚衙门告状,控告林土豪横行霸道,仗势侵占,请省里主持公道。福建布政使、巡抚作出批示,说鼓山涌泉寺乃享有盛名的800年古刹,寺院的前后左右,山场树木,历来都由官府严加保护,不许村民侵占破坏,该案件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,以后村民纷纷前来挖坑造墓,那堂堂佛教名山、禅宗圣地,岂不变成了坟头遍地的乱葬岗?总之此案事关名山形象和省会脸面,要求福州府秉公执法,不得偏私。

在上级压力下,福州官府再次组织人员复查。经多番查证,得知该林姓墓葬根本不是多年旧坟,而是几个月前,林家人听说鼓山般若庵那边一处“风水宝地”,就偷偷营造了墓穴,将先人遣散迁入,还立了“康熙八年”的木牌,以图混迹视听。官府另外查明,在鼓山乡里的土地档案图里,也从无该地林氏墓穴的记录,可见分明是近期私自移入。

林家人见在坟墓年份上做不了文章,又异想天开,强辩说般若庵这边离涌泉寺颇有一段距离,本不属于寺院的田产,而和尚们却在这里耕种、居住,难道就不是涌泉寺侵占民田?

涌泉寺监院僧道悟本来是控告林氏侵占僧田的,没想到林家人现在居然倒打一耙,反说僧人侵占民田。想来道悟和尚就是有再高的禅学修养,估计也要金钢怒目了。

林家如此荒唐的论调,连官府都看不下去,当即找来控辩双方,另请地保、乡绅见证,带上山地田亩档案印册,现场勘查,再次确认般若庵属于涌泉寺地,林家墓穴侵占事实清楚,不容辩驳。

康熙十二年(1673年)七月,经过半年多的反复调查、调解,福州知府最终发出告示,并勒石刻碑,昭告百姓。说林家墓穴本属侵占无疑,原本应该迁走,但鉴于林氏先人尸骨已经入土为安,死者为大,姑且免其再次动迁,以体现父母官的仁慈爱民和佛门的慈悲为怀。

石碑告示中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明确公布了鼓山涌泉寺周边保护区的东西南北界限范围(四至),申明界限区内严禁民众营造墓穴、砍伐树木等,以维护鼓山涌泉寺的清静禅修和名山环境。如有违背,严惩不贷。

林家墓穴侵占案就此落下帷幕,尽管坟墓没有迁走,但鼓山涌泉寺又一次得到了官方的权威站台和行政保护。那块告示石碑至今还立在涌泉寺内,成为古代福州官府保山护寺的历史见证。

除了盗墓,鼓山胜地另一个需要重点防范的问题就是滥砍滥伐。经过数百年的封山育林,到了清乾隆初期,涌泉寺四周形成了大片的松树林和樟树林,这些数以万株的大树高耸入云,枝繁叶茂,成为鼓山的一大胜景。

不过在清乾隆八年(1743年),却突然掀起了一股盗砍鼓山树木的浪潮,使得大量巨树被砍,严重破坏了鼓山的山林景观。

事情的起因是当时福州建造海船,需要大量

木材。有人见鼓山万树参天,就动起了坏心思,开始偷偷砍树伐木,运下山出售,以牟取暴利。消息传开之后,更多人跟风前来加入了滥砍滥伐的队伍。不过要将高达几十米的大树砍倒并运下山,靠单打独斗的三二村民根本做不到。这时候就形成了“专业”团队,有钱人出资在鼓山上搭起棚子,雇佣工匠砍伐树木,现场加工成柱子、木板等,再安排人运走贩卖。而加工剩下的树枝树杈树皮等,则吸引了众多附近村民前来拾捡。一时间,鼓山上每天砍树的、加工的、捡树枝的,居然多达数百人,男女老少都有。

涌泉寺僧人无力阻止此种乱象,只得报官求助,但收效甚微。盗伐风潮反而愈演愈烈,短短几个月时间内,方圆几十里的林木几乎被砍伐一空,鼓山露出了光秃秃的一大片。

发展到后来,甚至连涌泉寺内的大树也被砍伐,寺庙的山门、围墙、道路都遭到了破坏,情况之惨,堪称佛门劫难。

事情最终惊动了福建巡抚周学健,周巡抚震怒于名山古刹居然长期遭暴民肆意蹂躏,下令福州知府和城防将领,派出衙役、士兵,前往鼓山执法,将盗伐奸民当场捉拿,又将捡柴村民通通驱散。为防止盗情反复,周巡抚一面派兵暂时驻守鼓山,一面上书朝廷,申请在鼓山增设驻军小队(鼓山汛)。乾隆皇帝很快批复同意,从此鼓山涌泉寺旁常驻一队士兵,人数有二十人,专门负责管理山场树木,稽查附近村庄的盗砍奸人。

八闽古刹涌泉寺再次得到了官府庇护,重现了往日安宁。巍巍鼓山也慢慢地恢复生机,重新变得林壑幽美、郁郁葱葱。

(作者单位:中共福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宣教处)

说史谈闻

福建文献记载最早的石敢当的实物,是宋代庆历四年(1044年)在莆田出土的唐代大历五年(770年)“石敢当”石铭。石铭曰:“石敢当,镇百鬼,压灾殃。官吏福,百姓康。风教盛,礼乐张。”这在明代黄仲昭《八闽通志》以及《莆田县志》中均有详细记载。

现存最早的实物原位于福州市盖山镇高湖村,今嵌于福州市于山九仙碑廊的“石敢当”碑,碑高1.06米,宽0.49米,刻于南宋绍兴年间,碑文曰:“奉佛弟子林进晖,时维绍兴,命工彻石路一条,求资考诞生天界。”可见,唐宋时期石敢当习俗已融入寻常百姓家。

关于石敢当习俗在琉球的广泛传播,册封使和使团成员的回忆录中多有记载。清乾隆二十一年(1756年),册封副使周煌出使琉球,见到许多民众门前立有石敢当,在其《琉球国志略》中曾记载,“屋上、门前,多安瓦狮,及立片石,刻‘石敢当’者”。

清嘉庆十三年(1808年),作为太史的“司笔砚”沈复随册封正使齐鲲、副使费锡章前往琉球,撰写的《浮生六记》见闻琉球“人家门户,多树石敢当”。

他们的记录明显地阐明石敢当习俗在琉球相当普及。

琉球石敢当习俗的发展,与琉球使团借贡之机往返于中琉两地,考察民情、研学感悟密不可分。福建是琉球对外交流的窗口,也是研学的目的地之一。再者,琉球使团从福建北上入京,途经山东一带,遇见许多泰山石敢当的情景,也必定会将这一习俗与已经在琉球传播的福建石敢当习俗融合起来,使得琉球石敢当不断丰富起来。

清雍正十一年(1733年)在琉球出现了泰山石敢当。“年号铭入泰山石敢当”位于具志川村的村口(现冲绳久米岛町),高1.15米,宽0.4米,厚0.12米,碑文记载:“□正十一年癸丑 泰山石敢当 八月吉旦。”这是冲绳目前形体最大的石敢当。琉球石敢当数量之多,基本未法明年号,而直接在石碑上明确镌刻年号的仅此一件。

石敢当立碑年代首字被磨灭,按照中国历代年号可知,其立碑时间应为清雍正十一年(1733年),至少指出在雍正年间泰山石敢当已传入琉球。泰山为中国五岳之首,在石敢当前加上“泰山”二字的数量极少,既表达出对山岳神灵的崇拜,又加持了石敢当的辟邪、化煞功能。然而,在尚泰王时期,泰山石敢当的“泰”字为尚泰王故意损毁,也遵循为尊者讳的说法。

在琉球还出现与姜太公相关的泰山石敢当。收藏于石垣市八重山博物馆的“姜太公在此·泰山石敢当”,始建年代不详,曾立于路边辟邪祈福。中国北方在新屋正梁上常常粘贴“姜太公在此,诸神退位”的符语,祈福避凶驱邪、祈福挡灾,也是一种心理寄托的表现。琉球不只沿用此做法,还把“姜太公在此”与“泰山石敢当”相结合,攘解禁忌,增强祈福效果,确保建筑竣工大吉。查阅已知的琉球石敢当中,“姜太公在此·泰山石敢当”也仅此一件。

琉球在传承福建石敢当习俗的同时,还与当地民俗文化发生整合演变,逐渐形成本地化特征。其中,梵字石敢当最具有琉球当地特色。梵字含有消除所有的罪孽烦恼,脱离欲望,如同虚空一般,消灭一切的恶念与恶缘的意思。

关于琉球梵字碑,最早可在《琉球》中找到相关记载。《琉球》曰:“(明)正德年间,有日本僧日秀上国随波至国,念经立碑(碑有梵字一字),以除鬼魅。自此而来,妖怪不复起矣。”在石敢当前面加上梵字,是起到加强石敢当咒语威力的目的。

梵字石敢当在琉球只有两件,一件立于中头西原町的一条T字道路对面位置,一件位于丰见城市,但碑上均未标明立碑的具体时间。

琉球的石敢当习俗最初源于福建,双方在交流互动中,琉球很大程度上包容并吸纳了石敢当习俗的精华,又陆续出现泰山石敢当,以及具有当地特色的梵字石敢当,使其民俗文化逐渐“活”起来。由此说明,琉球的石敢当习俗根在福建,形在琉球。

(作者单位:福建开放大学)

琉球石敢当「根」与「形」

□钱宇